

◀ (上接8版)

人群让卡欣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。在共和国当时的首都日惹街头，卡欣巧遇苏加诺的演讲。当时日惹的报纸并没有提前通报这次集会，然而人们却像收到神谕一般，从四面八方闻风围聚而来。卡欣站在人群中，远远地仰视苏加诺，感受着他的身上的闪耀着“克里斯马”(chrisma)之光。苏加诺讲述着印尼的“光荣与梦想”，话语清晰有力。听众时而陷入静寂，时而爆发出阵阵欢呼，好像他们也融入到革命与历史的伟大进程中。卡欣清晰地感受到，在美国官方眼里大过一切的“共产主义”背后，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在支撑着共和国的革命。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在每个人的身上滋长，在集体行动的“盛典”中爆发，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力量。他意识到，印尼的民族主义并非仅仅集中在上层精英，而是有着广泛的基层民众基础；共和国的独立也绝不仅仅是青年精英的作为，而是有着广大印尼群众的支持。印尼的国家认同也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而形成的。

在对共和国普通民众的观察之外，卡欣还从印尼的党派和领导人入手，着重分析了共和国政坛的内部状况。独立后的共和国，各派政治势力群起，外界看来平静的政坛之下实则暗流激荡。共和国的政党派系林立，单是影响较大的就有马斯友美党、民族党、社会党和共产党，代表着民族主义、伊斯兰民族主义、社会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。各个党派秉持不同的理念，对于对外关系、乃至国家的未来都有着不同的设想。党派矛盾复杂，内阁更迭频繁，身为总统的苏加诺奔走于各个政治派别之间，仍旧无法维持政局稳定。卡欣搜集利用了许多珍稀档案，还对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采访。这些领导人都对卡欣的研究非常感兴趣，也乐于借助卡欣之口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。卡欣将印尼复杂、纷乱的政局条分缕析，分析了每个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倾向、性格特点，用简练的文笔勾勒了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、矛盾、妥协、冲突，呈现共和国政治的“全纪实”。卡欣详实的记述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印尼革命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。

《印尼的民族主义与革命》是第一部研究现代印尼政治的学术著作。到今天，很多学者批评卡欣的著作过于注重事件的记述，而缺乏理论性的总结。这种观点不免有些苛



卡欣在军队担任下士

责。考虑到在那个年代里，大部分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印尼这片区域，《印尼的民族主义与革命》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。在学术基础薄弱、材料匮乏、消息被封锁的状况下，卡欣深入印尼，完成了对印尼革命的详实记述，单从这点看就已经颇为不易。他在书中传达的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观点，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和同情，更使得这部作品与众不同。在五十年后的今天，它依旧是了解现代印尼政治的必读书。

卡欣的其他几部著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公共影响。《美国对越南的介入》分析大量史实，严谨又不失明了，成为当时了解越南纷乱局势的经典著作；不仅在学界影响深远，也成为很多政客桌头的必备读物。1995年，卡欣与其妻子合著的《以颠覆为外交政策：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印尼的隐秘溃败》(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: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)，揭露了CIA在印尼的颠覆活动，改变了许多人对印尼政治乃至美国政策的看法。

卡欣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他是东南亚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。没有以卡欣为代表的新一代东南亚研究人的引领与铺垫，东南亚研究很难生发出日后的光辉。安德森的评价最为中肯和恰当：“卡欣对下一代东南亚专家施加了强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。”(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：《比较的幽灵，民族主义、东南亚与世界》，甘会斌译，译林出版社，2012年，22页)

## 东南亚研究的领袖

1951年，年轻的卡欣来到康奈尔大学，加入新成立的“东南亚项目”。此后的五十多年里，在卡欣的引领与经营下，东南亚项目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地区研究模式，培养了众多杰出学者，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的东南亚研究。

卡欣的成功是在战后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取得的。简单说来，地区研究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，整合各种学科资源，对某一地区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进行集中研究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组织形式。地区研究是一场规模宏大、影响深远的知识建构事业，是战后美

国学术的一项重要成就。它影响和改变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式。

地区研究的创生也经历了曲折、复杂的过程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地区研究，我们需要从美国对海外世界的兴趣和探索讲起。美国对海外世界的兴趣由来已久，尤其是东北部上层人士中多有对异域的知识和文化兴趣。他们带着好奇和欣赏的眼光去搜集世界各地的艺术品，有人也研究东方的思想与文化。但长期以来，美国的域外文化兴趣似乎并不指向东南亚。1898年美西战争后，美国占领菲律宾，推动了一波海外知识热。但是直到20世纪，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还停留在个人兴趣的层面，国家和公众的了解大多只能依靠传教士、外交官和记者等“业余人”性质的研究与写作。

19世纪末高等教育革命以来，诸如政治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纷纷进入美国大学，学术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不断加深，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智识进步。然而海外研究依旧被排斥在正统学术研究之外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外研究需要克服诸如语言和文化隔离的障碍；另一方面，相对于老牌的殖民国家，美国海外殖民时间短，所以更缺乏相关研究基础。直至二战前的1940年，美国大学和学院的15万教师中仅有200人从事与外国有关的研究，而当年获得国际研究方面博士学位者不超过60人，而且大多数研究古代问题。国外研究依旧处于学术体系的边缘。

珍珠港事件后，战争暴露了美国海外知识的严重短缺，美国开始着手改变这一局面。军方项目的设立成为地区研究发展的重要契机和开端。鉴于

很多学生即将到远东服役，康奈尔大学在1942年开设了中国和东南亚相关的课程。在1943至1944年期间，军方又在康奈尔设立了“中国地区和语言项目”(Chinese Area and Language Program)。二战结束后，康奈尔利用战时军方项目的遗产建立了远东研究学系(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)。

1950年，康奈尔设立东南亚项目，为远东研究学系下属的研究生项目。康奈尔也成为继耶鲁之后，最早设立东南亚地区研究中心的美国大学。卡欣进入东南亚项目后就被委以执行主任的重任，1960年更成为项目主任。他对于地区研究项目的发展有着一套完整的设想。在创立初期，东南亚项目面临很多挑战，其中之一就是要处理地区研究项目与常规系科之间的关系。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用“学术场域”概念试图加以说明的，大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于社会世界的非功利性、非权力性场所。在学术系统中也会存在着层级分化以及资源争夺的现象。二战后的美国大学中，也有着极为强烈的学科门户主义。在地区研究出现后，很多学科都将其视为争夺学生资源的竞争者。

正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反对和阻力，卡欣没有将东南亚项目建成独立的院系，而是顺势与原有院系合作开设“联合培养计划”。项目中的老师和学生依旧隶属于常规系科，教师要在常规系科中讲授课程，项目开设的课程也都列入常规系科课程目录之下。东南亚项目不会为学生授予单独的学位，只是学生的“辅修”专业；学

▶ (下转10版)



卡欣(后排左二)与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(后排左三)、外交部长阿古斯沙林(第二排左二)以及两人的家人,邦加岛,1949年5月